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6.09.001 网络首发时间：2026-10-30 13:00:46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11.3536.F.20261029.1631.002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时代命题、理论贡献与科学实践

张友国

摘　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实践层面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理论层面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应如何增强发展韧性、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呢？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以国民经济循环为研究对象，揭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和内在机理，回答了上述时代命题，形成了自主的理论成果。其中，关于如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重构国民经济循环模式、应对世界市场风险的理论阐释，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内涵，实现了理论创新。自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来，中国依据这一理论启示，在增强有效供给能力、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分配流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面对“十五五”时期乃至未来更长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可以预期，中国将遵循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不断深化其科学实践。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国民经济循环；有效供给；扩大内需；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引言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全面部署，并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继续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重大战略任务作出部署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

作者张友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电子邮箱：zhyouguo@cass.org.cn。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VRC030）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求是》，2023年第8期。

指导思想,明确将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重大突破列为“十五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之一,进一步凸显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性、战略性和紧迫性。与此同时,新发展格局已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标识性概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已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回应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亟待破解的重大现实问题,围绕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内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过去几年,在从中央到地方出台并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同时,学术界也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了大量的研究阐释,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要求以及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展开。一是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出发讨论其实现途径。例如,裴长洪和刘洪愧(2021)、洪银兴和杨玉珍(2021)、李帮喜等(2021)分别基于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和分工理论、价值循环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展开论述;高培勇(2021)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阐释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并提出了行动路线。二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内在逻辑进行梳理并提出政策思路。例如,逄锦聚(2020)从市场实现、世界大变局、高质量发展要求三方面诠释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意义和思路;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从双循环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建议。三是聚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相关重大现实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例如,陈彦斌(2020)从需求侧强调提升居民消费与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郭克莎和田潇潇(2021)、魏后凯等(2022)从供给侧分别论述如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谢富胜和匡晓璐(2022)以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结合的视角展开讨论;赵扶扬和陈斌开(2021)、黄茂兴(2026)从改革开放方面分别阐述了土地的区域间配置、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及其重点任务。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做了定量分析,如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风险分散水平的影响(李敬子等,2023),等等。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大多从战略视角阐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其作为一个创新性经济学理论所进行的研究仍不充分,尤其缺少对其创新性的系统讨论,对其如何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的分析还有待深化。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发展的视角研究阐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论述清楚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回应的时代命题或重大现实关切是什么;二是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回应时代命题,从而形成自主的理论成果并实现理论创新;三是与其理论体系相一致的科学实践进展怎样、如何继续推进。本文试图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厘清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何以成为一个科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并对现有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解答的时代命题

任何有重大价值的理论都是顺应时代要求、回应时代之问而产生的,都有其现实

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①]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这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②]在这一阶段,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发展基本面长期向好,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如何顺应国内外形势演变趋势,高质量完成新发展阶段的目标任务,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1.如何积极应对世界百年变局以增强发展韧性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正在深刻重塑世界格局,中国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其中,大国博弈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美国虽然仍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国,但其经济发展近年来一直面临高通胀、政府财政赤字与债务高企、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制造业持续萎缩、贸易失衡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安定有序,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综合实力不断增强。面对这一形势,美国试图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采取各种措施遏制中国发展,包括采取关税战等需求侧施压手段、高科技封锁等供给侧脱钩断链手段。长期以来,美国是中国最大出口目的国,且2025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额仍占出口总额的11.1%,同时美国仍是世界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2026)和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WIPO,2025),因而美国针对中国的各种遏制措施从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可能对中国产生较大冲击。如何妥善应对中美博弈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增强自身发展韧性亟待破解的难题。

由此引发的国际力量消长变化,也使中国面对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正逐步下降,其影响世界格局的能力正在减弱。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占有的全球经济份额稳步上升,影响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了与共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同时,也有一些西方国家逐渐采取相对务实的应对措施,不排斥乃至比较积极地寻求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在此情形下,中国总出口中,对非美国市场出口的份额逐年上升,对外贸易的多元化格局日趋明显。另一方面,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进趋势,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妄图推行霸权主义,攫取不正当利益,破坏国际公平正义。中国以外的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虽然正在壮大,但体量有限,还难以为中国发展提供足够强大的外部动力。尤其随着保护主义抬头,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

① 参见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② 参见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易国,中国更是难以完全避免保护主义的冲击。如何把握住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的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是新发展阶段中国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既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也显著增加了发展道路上的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在此外部环境下,中国亟须把握机遇、防范化解风险。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加速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未来产业蓬勃兴起,全球经济发展的空间不断被拓展、新赛道不断被开辟。无论是科技革命还是产业变革,中国在其中多个领域正在形成或已经具备了强大竞争力,如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但中国在一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领域仍存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核心零部件、核心基础材料、高端装备等的"卡脖子"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制约中国的科技创新,也制约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高质量发展。在大国博弈日趋复杂激烈的背景下,如何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

2.如何充分释放本国潜力以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高质量发展,已经使中国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成为拥有诸多优势、对全球经济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但是,中国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突出问题。如何充分发挥国内优势、有效克服发展困难,是中国在发展战略抉择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亟待将自身经济所具有的多重优势转换为发展新动能。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居于较高水平,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按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35年和2050年还将连续迈上两个新的大台阶。由于经济增量巨大,而国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中国要确保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还需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不仅具备形成强大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物质条件,也具备相应的制度优势。一是与巨大经济体量相对应,中国拥有巨大规模国内市场,这蕴含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需求动力。二是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就业率长期保持较高水平,且人均收入增长较快,这为中国的消费总量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创造了良好条件。三是中国产业体系完整,特别是制造业发达,这为中国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进而保持国内大循环畅通提供了强大保障。四是中国不仅人口规模巨大,还具有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国内大循环所需的各类人才。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优化国内大循环中各类资源和要素的配置。如何充分发挥上述一系列优势以形成牵引发展的稳定动力,是新发展阶段中国把发展不确定性和风险降至最低,同时让其他国家和地区分享这一战略红利所要

解决的核心问题。

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结构性演化趋势，这些趋势是制定和实施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依靠“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方式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随后推出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地区、内陆地区开放等发展战略，使中国逐步构建起全国范围内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而稳步上升，而且进口比值和出口占比大致接近（如图1所示）。同一时期，最终需求的内需占比则呈现缓慢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原有发展模式整体上是以加工贸易驱动为主的国民经济循环模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有发展模式开始发生趋势性转变，出口的驱动力趋于弱化，而国内需求的驱动力趋于增强，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的主从关系发生变化。如何顺应国民经济循环模式的变化，是新发展阶段中国提升宏观治理效能、实现持续稳定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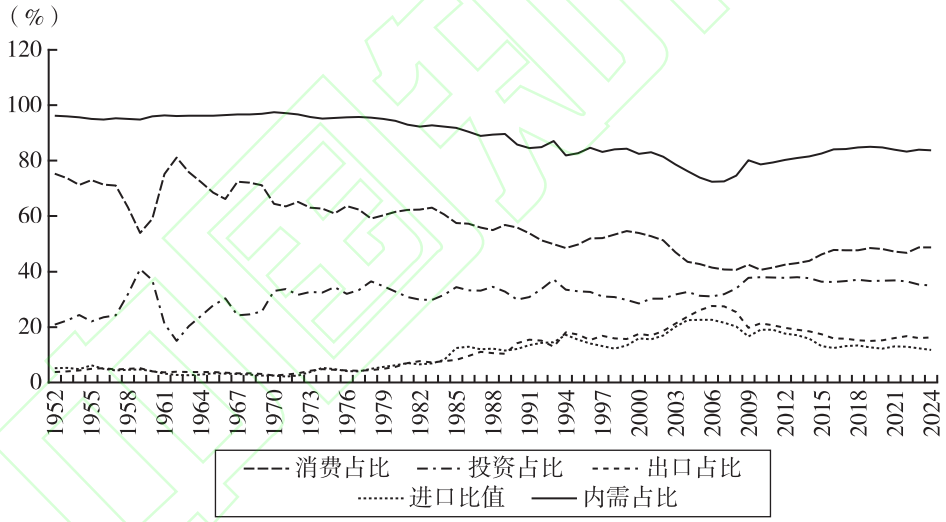


图1　1952—2024年中国的最终需求相关指标

当然，中国自身发展仍面临一系列困难挑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在诸多方面，如供求不平衡、供给结构失衡、需求结构失衡、有效需求不足、投资效益不高、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等。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挑战，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改善民生福祉的必答题。

综上所述，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诸多变化已经使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现实环境与过去有了极大不同，以往的发展格局难以有效支撑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既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一系列发展挑战，

潜藏着诸多风险,进而形成了新形势下中国实现既定发展目标所要回答和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发展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共同构成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要解答的时代命题。

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要回答的重要时代命题,概括而言,就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和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揭示了国民经济循环演变规律,成为指导新时代国民经济循环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理论,实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1.回应现实关切,形成理论成果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科学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因素影响中国发展的实质,并结合唯物辩证法提出了解决方案,继而形成了新时代以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理论创新成果。简要而言,这一理论主要涵盖国民经济循环两个维度的战略布局及其实现思路:一是在循环质效维度要"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即提升国民经济循环质效;二是在循环模式维度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即重塑国民经济循环模式。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两个维度来研究和布局:一是更有针对性地加快补上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二是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①]核心思路就是,通过促进供给与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循环两个维度的战略布局。上述战略布局明确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目标,回答了新发展格局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问题。其核心思路系统勾勒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路径和主要举措,回答了如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问题。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具有内在逻辑自洽性,系统回答了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如何应对国内外困难挑战并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深化了关于国民经济循环的理论认识。

(1)"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深刻揭示了国民经济循环不畅是各国经济发展所面临问题的根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循环顺畅,物质产品会增加,社会财富会积聚,人民福祉会增进,国家实力会增强,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在宏观上就会

① 参见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求是》,2023年第8期。

表现为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情况，在微观上就会表现为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居民收入下降等问题。①当前，国内外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之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挑战，是因为它们可能阻滞国民经济循环。就国际形势而言，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采取脱钩断链、科技封锁、干扰中国获取关键矿产资源等手段，可能阻断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贯通，妨碍生产向消费的有序转化，从而造成中国经济循环的堵点、断点。同时，如果把握不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就难以及时转型升级，供给就难以满足国内外市场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从而降低经济循环效率。就国内情况而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经济循环过程中存在卡点、堵点、断点。例如，生产与消费在品种、质量、空间上错位，导致生产与消费之间不能顺利转化，形成宏观层面的供求不平衡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脱节，导致资源和要素难以顺利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而导致供给结构失衡、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投资效益不高、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蕴含的对国内外风险因素及其潜在危害的本质性认识，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②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③这个“总体”可以理解为社会再生产过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就是国民经济循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④例如，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国民经济循环不畅，具体表现为生产不断扩展而消费被抑制的矛盾。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⑤，也就是产能过剩与就业困难并行是难免的。显然，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无阻是减缓和化解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保证国民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

（2）“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新发展阶段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把握发展主动权对国民经济循环模式要求的理论回应。唯物辩证法认为，

① 参见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②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3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④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3页。

⑤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3页。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是根据,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明确国民经济循环的主体是国内大循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则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

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直接体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即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当今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循环都可区分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部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导权,同时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既可以、也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

中国只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各种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才能把握蕴含其中的机遇,并更好地迎接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表明,如果国民经济对世界市场依赖度较高,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使生产陷入困境。就国际形势而言,中国发挥战略主动性,参与全球治理的空间明显增大,推动外部环境朝着有利于中国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变化的条件不断增多。但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经贸和科技遏制行为难以避免,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能提供的支撑空间还很有限,且逆全球化浪潮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因此,中国需要更多向内发掘发展动力,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国内大循环。

国内大循环是贯通全国各地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①]马克思在阐释社会再生产理论时指出,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②]这种地方自我小循环,就是人为将超大规模市场分割成众多小市场,从而限制商品交换范围、压缩市场规模,直接阻碍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极不利于产能在空间上的科学布局、生产要素的空间合理配置、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便捷消费,继而也在国家层面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四个环节之间的有序衔接和国内大循环。因此,地方自我小循环与国内大循环的要求背道而驰,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所不允许的乱象。

另一方面,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应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也要求积极利用国际有利因素拓展国际循环,推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形成良性互动。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充分肯定了世界市场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① 参见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②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①]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既充分肯定了国际循环的不可或缺性,也充分肯定了世界市场蕴藏的巨大生产力促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②]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经过历史证明的党治国理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一招。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格局的扬弃和超越,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对外开放,更不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国民经济循环模式。[③]增强国内大循环有利于中国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发展经济。

同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要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马克思曾论述了世界市场对制度变革的重要推动作用,他指出,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倍增,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宝藏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表明,通过拓展国际循环,可使国内大循环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市场发生联系,这将为国内大循环创造更大的战略空间,为国内生产创造更大的需求。拓展国际循环也将使国内经营主体、科研机构、政府部门等直面更激烈的竞争、更复杂的挑战,包括产品和服务销售、资源要素获取、安全保障等各方面。要在国际循环中赢得竞争、战胜挑战,就必须发挥战略主动性,不断提高科技、管理水平,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因而,国际循环的拓展有利于倒逼国内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进而有利于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

(3)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是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国民经济循环新模式的核心思路的理论概括。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⑤]也就是说,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形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5页。

② 参见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③ 改革开放前,尽管国民经济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但国民经济属于“短缺经济”,生产能力不能满足消费需要,分配与交换以政府计划为主,效率不高。同时,因多方面条件限制,改革开放前对外贸易规模小、贸易伙伴少,国际循环很弱。新发展格局与改革开放前的国民经济循环模式有本质不同。

④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71页。

⑤ 参见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求是》,2023年第8期。

成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牵引新供给的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思路,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高度契合。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特别指出,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直接的同一性。马克思指出,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国民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生产的消费,可是还作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后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①其次是生产和消费相互依存、互不可缺。马克思指出,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②再次是生产和消费互相创造对方,进而创造自己。马克思指出,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③这种生产和消费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定程度上就是供给和需求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生产和消费之间或供给与需求之间不断相互转化、相互创造,就能实现持续的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无阻。

实现供给与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还要把握以下两个重点:

一方面,要将供给侧有效畅通作为现阶段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对整个国民经济循环起决定性作用,供给侧有效畅通就是生产有效畅通,必然会对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④而供给侧有效畅通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补上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突破关键材料、零部件、设备制约,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快速形成。同时,还要大力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突破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难题,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如此,可望增强有效供给能力,提供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使生产能适应需求升级的需要,同时创造更多就业并促进居民收入提升,从而有效激发需求增长动力和需求能力,继而使供给能创造有效需求。

另一方面,要将扩大内需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必然要求增强国内大循环，主要举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只有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通过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形成超大规模、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使内需成为国民经济循环的强大动力，才能在增强国内大循环上事半功倍。只有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才能保证供给和需求两端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这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②扩大内需的内涵也极其丰富，包括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也充分论证了，社会再生产得以实现的条件，就是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生活资料生产部类的资本要保持合理比例。扩大内需强调要处理好一系列重要关系，与此高度一致。

2.把握时代特征，实现理论创新

如何在新发展阶段解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遇到的紧迫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直接回答的，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经验不能直接套用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价值在于，以解决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系统的创新理论。具体而言，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取代，而没有具体阐述如何维持社会再生产和利用好世界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则阐释了如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如何转变国民经济循环模式以及如何规避世界市场风险等问题。关于这几个问题的论述，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马克思所处时代以来人类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提炼。

（1）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关于国民经济循环畅通途径的阐述，开辟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新境界。马克思指出，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③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循环被打断是必然的、周期性的事件，此时必然爆发经济危机，进而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强制供给与需求平衡。基于马克思社会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② 参见习近平：《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求是》，2025年第24期。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3页。

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与消费不平衡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具有必然性,因而不可能存在经济危机之外的其他促进供给与需求平衡的途径。当然,可以认为马克思给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终极方案,那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社会要求生产力高度发达,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如何促进供给与需求平衡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马克思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具体答案,但显然这个问题在过渡阶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则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着重阐述了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如何促进供给与需求平衡的问题,甚至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例如,用"打通任督二脉"类比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以此阐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性。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论述供求平衡途径的同时,也论证了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采取积极干预手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开辟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新境界。

(2)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性地提出,通过重构国民经济循环动力结构,重塑国民经济循环模式。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国民经济循环内在机制可以推断,在特定时空情形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也就是推动国民经济循环的主导动力是会变化的,由此会形成不同的国民经济循环模式。同样的道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而不是考虑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自然不会关注并论述这一问题。但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就不得不对其进行研究和解决。而且,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也表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国民经济某个环节的特定组成部分,特别是生产和消费环节的特定组成部分,往往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循环的主导动力,例如,生产环节中的某些支柱型产业,分配环节的某些或某类要素(资本、劳动、技术、数据等)集聚,交换环节的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消费环节的消费类型(产品或服务)及消费主体(国内或国际)。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转变国民经济循环模式是一个重要问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无疑是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有益拓展。它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明确了国内循环动力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相对于国际循环动力的主导作用;强调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明确了基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供给能力是推动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力量;强调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明确了在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循环的过程中内需居于主导地位。简而言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表明,国民经济循环可以呈现出不同模式,发展社会主义要因时因势主动调整国民经济循环模式,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

(3)"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构想,拓展了马克

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开放局面,高度重视国际循环对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作用,与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有防范世界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考量,与马克思阐释的世界市场不确定性高度契合。如前所述,马克思虽然指出了世界市场的风险,但似乎没有提出化解风险的直接办法,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可采取的相关行动方案。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世界市场的风险是无法避免的。诚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世界市场由少数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社会主义力量还很微弱。但当前,世界市场已经呈现多极化格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和作用已经不可忽视,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在世界市场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利用好世界市场发展生产力,同时有效规避大国博弈、逆全球化浪潮、贸易保护主义等带来的世界市场风险,是当今世界市场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新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显然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回应这一问题的理论创新。就中国而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不仅能有效规避世界市场风险对发展的不利影响,更能以国内巨大且稳定的发展力量为基础,更好利用世界市场。就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中国的国内大循环是世界市场中最具确定性、最具活力且规模庞大的一部分,中国做强国内大循环,无疑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极富前景的发展机遇。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拓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为规避世界市场风险提供了理论方案。

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实践

构建新发展格局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但不能消极、被动地等待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演化,而应根据其内在规律顺势而为,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前瞻性、指导性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举措。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把握好的六个重要着力点。[①] 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五方面战略部署,强调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着力破除制约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矛盾和问题。[②] 这些重大战略思路和举措,直指国民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断点问题,有力推动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实践。

① 参见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② 参见习近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求是》,2023年第8期。

1.科学实践进展

(1)增强有效供给能力,打通经济循环堵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提高有效供给能力。①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2020—2025年,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从52.1%和73.0%提升至68.6%和85.5%[①],每千瓦时火力发电标准煤耗下降1.1%[②],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成效明显。②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0—2025年间高技术制造业占比、装备制造业占比分别提高2.0个百分点和3.1个百分点;2025年,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是2020年的11.35倍、1.85倍和3.65倍[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新动能不断增强。③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例如,2025年,移动通信基站总数为1287万个,较2020年增长38.2%[④],有效支撑了数字经济发展和网络强国建设。④深入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达170.1(2020年基期值为100)。[⑤]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解决有效供给能力受制于人的问题。①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已涌现出一大批标志性成就,如嫦娥六号成功探月、“奋斗者”号深潜万米、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成功构建、可控核聚变研究迈入国际第一梯队、C919大飞机实现商业运营等;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居第十位,比2020年高四位(WIPO,2020,2025)。②着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游戏科学、深度求索、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等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一批民营高科技企业脱颖而出,DeepSeek等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取得突破。③大力培养各类人才,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2025年,16—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30年,比2020年提高约0.55年[⑥];2024年,科研和开发机构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为61.80万人,比2020年增长18.98%。④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R&D经费投入强度从2020年的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和《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③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④ 数据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25年通信业统计公报》和《2020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⑤ 数据来源于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

⑥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2.40%提高到2025年的2.80%;年末有效发明专利由2020年的305.8万件提高到2025年的631.8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20年的6.3件提高到2025年的16件。①

(2)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全面促进消费,多管齐下促进消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充分发挥消费带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性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2025年最终消费支出累计增长38.23%;最终消费率持续上升,从2020年的55.4%逐步上升至2025年的56.9%;2021年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居主导地位,2025年其贡献率为52.0%,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正在形成。主要做法包括:①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培育新型消费,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提升居民消费意愿,涌现出"村超"、3A游戏《黑神话:悟空》等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经济、文化产品。②加快完善城乡消费设施,健全促进消费的制度机制,改善消费便利性,如持续完善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北京市等地区落实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政策。③优化消费环境,不断减少居民消费顾虑,如海南省为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积极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反消费欺诈规定》《海鲜市场消费欺诈行为常态化监管机制》,开展"放心消费在海南"活动等。

积极拓展投资空间,持续增强投资拉动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2025年资本形成总额累计增长23.89%,2021—2025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4.16%。一方面,围绕新型基础设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乡村建设、交通水利、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大工程和科研设施、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重大项目加大投资力度,促进投资结构优化。"十四五"期间累计发行约16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地方重点建设项目;2024—2025年共安排1.5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2025)。另一方面,注重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促进民间投资。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地方层面,重庆市2023年出台《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5年重庆市民间投资重大项目数量较2021年增长约30%,总金额超4000亿元,较2021年增长约50%。

(3)完善分配、流通环节,提升经济循环效率。优化收入分配体制机制,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底气。①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充分发挥就业创造财富、促进分配合理化的基础性作用,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升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水平,使更多劳动者能够获得稳定、合理的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年度数据估算,2020—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4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年均增长5.65%,对提振消费形成基础性支撑。②统筹公平与效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2020—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5.41%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52.0%持续提升至2023年的53.1%[①],居民收入增长的分配基础总体有所增强。③持续稳步改善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底气。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比2020年分别增加7717万人、3229万人和3730万人。[②]

破除流通障碍,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①积极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十四五”期间,制定了物流领域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提出了构建“四横五纵、两沿十廊”物流大通道;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3.9%,较“十三五”末下降0.8个百分点[③],实现持续下降。②大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注重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资源、环境等各类要素资源有序流动、高效配置,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③注重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与民营经济互补共赢,2025年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4)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国际循环空间。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一方面,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优化国际循环空间。2020—2025年,中国对外贸易动能仍然强劲,2025年按当年价计算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45.47万亿元人民币,比2020年增长41.1%,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④]同时,尽管全球资本流动趋紧,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双向投资总量稳健,2025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1047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连续九年保持世界前三。[⑤]另一方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力拓展和深化与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2025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达23.6万亿元

① 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所包含的最新劳动报酬数据为2023年数据。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3.9%(https://www.ndrc.gov.cn/fggz/202602/t20260209_1403645.html)。

④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⑤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2026年1月22日)(https://www.mofcom.gov.cn/xwfbzt/2026/swbzklxxwfbh2026n1y22r/index.html)。

人民币，比2020年增长151.9%[①]；货物出口中对美国出口占比从2020年的17.4%下降至2025年的11.1%，货物进口中自美国进口占比从2020年的6.6%下降至2025年的5.4%。[②]

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巩固和提升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从过去依赖低成本要素的“世界工厂”模式，加速向依托完整产业链和创新驱动的“全球制造中心”与“世界市场”双重角色演进，推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出口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价值链掌控力稳步增强，2025年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7.1%，其出口规模比2020年增长3.5倍。[③]进口不再仅仅是满足初级加工需求，更多是为了支撑国内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和复杂产品生产，2025年用于高端制造的电子元件进口值相比2020年增长20.4%。[④]引导外资加速从传统的成本寻求型投资，转向创新驱动和市场寻求型投资，电子商务服务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等细分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75.0%、42.1%和22.9%。[⑤]

2.科学实践的深化方向与路径选择

尽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全面建成新发展格局仍任重道远。最突出的问题仍是供强需弱，其具体表现，例如2020—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从74.5%下降至74.4%[⑥]，消费者价格指数从102.5下降至100.0；2025年工业增加值增速（5.8%）明显高于居民人均消费增速（4.4%）和固定资本投资增速（-3.8%）。[⑦]供给方面，科技创新能力仍需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亟待突破，特别是基础研究能力亟待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也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如一些核心零部件仍大量依赖进口。需求方面，居民就业、增收仍面临压力；投资疲软与投资收益率低并存，民间投资尤为乏力；出口仍面临大国竞争博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带来的风险。分配和流通方面，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偏低、行业收入差距大等问题仍然存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不少障碍。“十五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围绕其战略目标，遵循其背后的规律，针对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以《建议》提出的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为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估算。

③ 海关总署2025年全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330/hgzs2025nqsjdjckqkxwfbh/index.html）。

④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月报数据估算。

⑤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2025年全国吸收外资7476.9亿元人民币（https://data.mofcom.gov.cn/article/zxtj/202602/64230.html）。

⑥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季度数据。

⑦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重点,开展新一轮科学实践。

(1)继续增强有效供给能力。一方面,要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①通过统筹农用地布局优化、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和林下经济、完善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底座。②以现代化生产方式优化提升矿产、冶炼、化工、纺织、机械等传统产业,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盘",稳固经济循环的基本载体。③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拓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生长点,汇聚经济循环的新动能。④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三产融合、数智技术赋能、文旅及生态资源价值转化等,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⑤通过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等,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设施体系,强力支撑产业现代化,有效带动内需增长。

另一方面,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①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美西方技术封锁。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实现更多"从0到1"的科技创新突破。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步伐。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支持由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增强体系化科技攻关能力;加强建设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型科研设施,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通过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等途径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③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包括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强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协同培育创新人才,壮大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国家战略人才队伍,通过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引育世界优秀人才。④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特别是聚焦大模型底层架构、智能芯片、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通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2)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首要着力点是大力提振消费。①通过促进就业、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稳定市场预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解决居民能不能消费的问题。②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与业态,发展智慧零售、绿色消费、银发经济、文体旅游等新增长点,解决居民愿不愿意消费的问题。③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生育养育、养老、教育、医疗等民生保障支出,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优化消费环境,解决居民敢不敢消费的问题。④加快完善城乡消费设施,如加强县级物流配送

中心和乡村终端物流配送设施建设，提升县域商业体系和社区便民生活圈功能，同时积极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升中国居民和境外游客消费便利性。⑤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清理汽车、住房等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建立健全适应“人工智能＋消费”、健康消费、低空消费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落实带薪错峰休假制度，增加居民消费机会。

同时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①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投资应聚焦：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区域发展、乡村振兴、国防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等等。②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③围绕提高投资效益积极探索、推动投资体制改革，通过全生命周期管理、盘活存量资产、严格问责机制等加强政府投资全过程绩效管理，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以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投资方向和重点。④通过全面清理对民间投资的不合理限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通过灵活运用财政资本金、贷款贴息、投贷联动等政策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

（3）进一步完善分配、流通体系，增强经济循环活力。一方面，要在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分配体制机制。①健全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以及管理和数据等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②按照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原则，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③通过鼓励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参与主体多元化、税收优惠、模式创新、强化依法监管、智慧监管等方式，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④根据参与财富创造的程度和实际贡献，同时通过实行垄断行业限薪、征收所得税等方式，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支持勤劳创新合法致富，鼓励先富带后富促共富。⑤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此外，还要发挥好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的再分配调节功能。

另一方面，要持续提升流动效率。①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增强国民经济循环动力。通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推进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保障民营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获得合法权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②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转化高效的技

术市场、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全国统一能源市场、全国统一资源环境市场;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积极推动闲置低效存量资源盘活利用。③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提升宏观治理效能,在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同时,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在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中的协同,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基础上,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

(4)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国际循环空间。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巩固全球价值链地位,拓展共赢发展空间,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①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按照先重点、后一般原则,推进各领域国内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支持各地区因地制宜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统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②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创新发展,开辟对外开放新空间。大力拓展和深化与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持续推动市场多元化、内外贸一体化、进出口平衡发展。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实现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③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强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激发各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性,增强共建国家发展能力和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拓展中国与共建国家合作新空间。同时,完善多元化、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加强海外利益保护。

五、结语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挥历史主动性的重大战略部署和行动指南。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机遇而规避其风险,发挥好中国经济发展巨大的内在优势而克服其中的困难,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也是其得以推进的实践基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将上述现实问题凝练为理论层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循环问题,并提出了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案,即建立畅通无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作为科学理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从理论上回答了如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如何重塑国民经济循环模式,如何利用好世界市场并防范其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拓展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创新。“十四五”期间,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形成了一系列与其理论体系相一致的科学实践,并取得了重要进展。

展望未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取得重大突破，实践的重点仍在于积极实施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以增强有效供给能力，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优化分配体制机制，破除流通障碍，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总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具有完备性和突出思想价值的经济发展理论，其科学实践必将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彦斌.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消费与有效投资[J].经济评论，2020，(6)：11-15.

〔2〕董志勇，李成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溯源、逻辑阐释与政策导向[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5)：47-55.

〔3〕洪银兴，杨玉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研究[J].经济学家，2021，(3)：5-14.

〔4〕黄茂兴.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1)：67-81.

〔5〕高培勇.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前行[J].经济研究，2021，(3)：4-13.

〔6〕郭克莎，田潇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21，(11)：44-58.

〔7〕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着力扩大有效投资[J].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5，(11)：37-41.

〔8〕李帮喜，赵奕菡，冯志轩，赵峰.价值循环、经济结构与新发展格局：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国际比较[J].经济研究，2021，(5)：4-19.

〔9〕李敬子，高重阳，何祚宇.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安全构建路径探索——基于供需风险分散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3，(12)：24-41.

〔10〕逄锦聚.深化理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J].经济学动态，2020，(10)：3-11.

〔11〕裴长洪，刘洪愧.构建新发展格局科学内涵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1，(6)：5-22.

〔12〕魏后凯，叶兴庆，杜志雄，樊胜根，罗必良，刘守英，黄承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权威专家深度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J].中国农村经济，2022，(12)：2-34.

〔13〕谢富胜，匡晓璐.以问题为导向构建新发展格局[J].中国社会科学，2022，(6)：161-180.

〔14〕赵扶扬，陈斌开.土地的区域间配置与新发展格局——基于量化空间均衡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1，(8)：94-113.

〔15〕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5[R].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6.

〔16〕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0: Who Will Finance Innovation[R]. Geneva: WIPO, 2020.

〔17〕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5: Innovation at a Crossroads[R]. Geneva: WIPO, 2025.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pochal Propositio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Scientific Practice

Zhang Youguo

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not only a major strategic task, but can also be seen as an origi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It has its epochal proposition and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originates from practice and forms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practice.

There are two epochal propositions that need to be answered by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s a theory. One is how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world's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o enhance development resilience, and the other is how to fully unleash the potential of China to seize the initiative of future development. These two questions are not only practical issues that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answer for its development but also important theoretical questions about development.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world market theory, combined with China's development situation,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ak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cycle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reveals the essence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China's sustaine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swers the above epochal propositions, and forms its theoretical system. Its main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is to achieve a high-level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re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ycle, enhancing the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resha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s.

Meanwhile,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as innovatively provide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n how to smooth the circul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reconstruct the 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model, and respond to world market risks. It argues for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adopting a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smooth the circul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emphasiz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 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mode in light of times and circumstances, and proposes a plan to avoid world market risks with the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 body. These have endowe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new connotations of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while incorporating beneficial components of Western economic growth theories, and achieve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ince propos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hina has implemented scientific practices based on its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chieving significant progress. Key scientific practices include: enhancing effective supply capacity to break through economic circulation bottlenecks, cultivating a comprehensive domestic demand system to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circulation, improving the distribution and transaction system to boost economic circulation efficiency, and expanding high-level opening-up to broaden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space.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beyond, China is expected to anchor its strategic goal of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y adhering to the development laws it has reveale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enhance effective supply capacity, expand domestic demand as a strategic base to strengthen the domestic cycle, further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and transaction systems to boost economic vitality, and better exp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space, thereby deepening its scientific practice.

Keyword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national economic cycle; effective supply capacity;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high-level opening-up

JEL Classification: B14; O11; O20

〔责任编辑:覃毅〕